



明史学家说



中国明史学会
十三陵特区办事处 编

明

史



『大明书场』集录

下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明史学家说 明史

——“大明书场”集录 下



中国明史学会 编
十三陵特区办事处



NLIC2970905609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史学家说明史：“大明书场”集录：全2册 / 中国明史学会，
十三陵特区办事处编.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4

ISBN 978 - 7 - 222 - 10815 - 8

I. ①明… II. ①中… ②十… III. ①中国历史 - 研究 - 明代
IV. ①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3461 号

责任编辑：赵石定 张 波 王 韬

装帧设计：杨晓东

责任校对：王 韬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 名	明史学家说明史——“大明书场”集录
作 者	中国明史学会 十三陵特区办事处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10815 - 8
定 价	80.00 元 (全 2 册)



第十一讲 明代中外文化交流和政治关系

明代中西文化交流，是世界上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在尊重和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前提下，介绍并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思想文化。而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受“经世致用”思潮浸染的中国士大夫，在对西方科技及其宗教有所了解之后，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双方在和平的、平等的基础上的交往，对中国和欧洲的社会变革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比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都更为密切。这种关系，既是以往中国各朝代与朝鲜传统联系的继续，同时也有这个时代新的特点。这一时期，朝鲜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学习和吸收，同时，在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中也有了新的变化，政治一体化关系已经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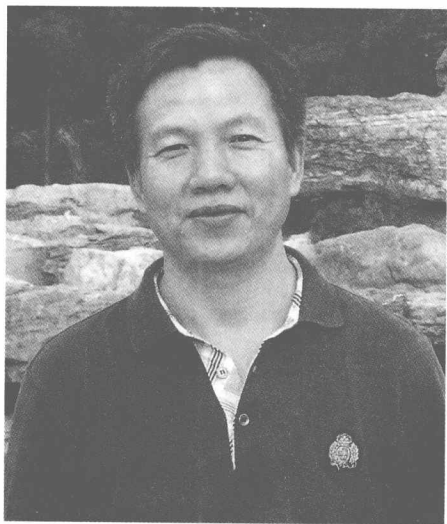
主讲人

沈定平 庞乃鸣 高艳林



沈定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接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邀请，赴上述两国访问讲学。著有《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季：趋同与辨异》等，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



庞乃鸣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史及明清中外文化交流史。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等国家重大文史工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著有《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明史·地理志〉疑误考正》，主编《盛世下的潜藏危机——张居正改革研究》，合著《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近代文官制度史略》等，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



高艳林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87~2002年，先后获南开大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2004年，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天津人口、明代地方藩王以及明代中朝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天津人口研究（1404~1949）》等，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高艳林：今天“大明书场”的话题是明代中外文化交流与政治关系。说到明代中外文化交流，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利玛窦来华，以及徐光启与利玛窦的个人关系，在这方面，沈先生是专家，我们请沈先生给大家做个解答。

沈定平：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在明代的中外交流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就是中国跟欧洲的文化交流。这个文化交流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在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以后，跟中国的士大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带来了西方的一些文化、科技，对当时的明代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为突出的是，当时像徐光启这样一些在朝中很有名望的“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他们将从西方学到的一些东西运用到明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以此来拯救明朝深重的社会危机。还不止这些，通过利玛窦把中国文化带到了欧洲，对欧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欧洲 17 世纪、18 世纪的社会变革，包括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都跟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关系。在这里，首先介绍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贡献。

利玛窦（1552～1610）出生在意大利中部马柴拉塔城一个既有社会地位又很有修养的家庭。他从小学习就非常好，容貌端庄，品德也很好。到十六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他送到罗马法学院深造，因为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够做官。可是他在罗马法学院念了三年后，一个决定改变了他人生的命运：他放弃世俗的荣华而听从宗教的召唤，加入了耶稣会。耶稣会是欧洲天主教下属的宗教组织，有很严格的规定，不许结婚，生活很清贫，绝对服从上级，无条件地到世界各地传教。这个耶稣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重视教育，有一套彼此衔接的教学体系，培养和提高修士的神学与自然科学水平。看一看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的

数学、天文、物理、地理等知识，大致都跟各级耶稣会学校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利玛窦等传教士是作为西方一种完整文化不自觉的代表（载体），而同中国士大夫阶层进行交流。

那么，为什么利玛窦受到人们如此重视呢？不仅西方学者注意他，而且中国学者也很注意他。这就不能不谈谈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他的第一个贡献就是他认为西方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处于同样发展的水平，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双方的交流应该是平等的。在当时欧洲文化至上主义非常盛行，根本瞧不起非基督教文化的氛围中，利玛窦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值得充分肯定。利玛窦的这种认识，是他来中国后通过实际的学习、体验和考察，并且在同他的祖国的现状进行比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那时候意大利根本不能称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不是今天被法国占领了，就是明天又被西班牙占领了，始终形不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使历代意大利人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所以利玛窦看到中国这么富强，这么统一，人民生活这么安定，社会秩序这么稳定，他就感到非常惊讶也非常欣赏。后来他寄给很多意大利人的信件里讲得十分清楚，他认为中国无论从政治上、生活上，还是在文化方面确实不比当时欧洲差，甚至还要强一些。因此，他在书信中不止一次说过，他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交战、作乱，而是为缔造和平。这种和平的、平等交往原则的确立，为以后 200 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与上述原则相联系，利玛窦的第二个贡献，即提出了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线。当时在基督教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是军事征服与精神征服紧密结合的传教路线，这特别表现在西方殖民

者征服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过程中。传教士直接参加军事行动，并在实际占领后，立即用武力强迫印第安人改变信仰，摧毁他们的庙宇、神像和一切传统文化的痕迹。印第安人稍微表示不满，便或砍或烧，实行血腥镇压。就是这样，在传统文化被消灭殆尽的废墟上，树立起西方基督教在当地民众中的绝对权威。

西方殖民者和一些鼓吹欧洲文化至上的传教士，也曾想把拉丁美洲那种传教模式移植到中国，但遭到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的抵制。这些熟悉中国国情的耶稣会士，不仅钦佩中国古老而优秀的文明，而且对中国强大的国防力量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决定放弃那种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刀剑的传教模式，探索另一种适应中国环境的传教方法。他们先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继而改换中国服装，通过传播科学来吸引民众。一直到利玛窦明确意识到只有适应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并为此对传教策略进行重大调整之后，这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路线才有了可靠的思想基础。这些重大调整包括：声称在儒家经典中发现了与基督教义相契合的地方；对敬天、祭祖和祀孔这些维系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礼仪，采取宽容甚至赞赏的态度；将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者即儒士阶层，作为教会交往和争取的主要对象等。从此，利玛窦的传教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功，他本人也经万历皇帝准允，在北京定居和传教。不仅如此，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这条适应性传教路线，为以后两个多世纪的传教政策、科学传播和灵活做法指明了方向。

利玛窦的第三个贡献，是他当时确实带来了西方比较先进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知识。这特别表现在数学和天文学领域。中国的数学在宋朝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可是到明朝数学已经很衰落了，许多宋朝和元朝的数学书到明朝就找不到了，即使能找到也不知道怎么

运用，所以整个数学水平在下降。同时下降的还有中国的天文知识。明朝使用的天文历书，还是沿袭元朝初期制定的历书，就是说400年间从未修订过历法，所以根据这种历书来测算日食、月食的时间，就会出现许多错乱，往往相差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明朝执政者也知道这个问题，但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科学方法来改变这个现状。

正好利玛窦及其后继者带来了西方较为先进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知识，为振兴明朝的科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涵。利玛窦发现，中国人重视数学，但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演绎推理的方法；他们虽提出各种各样的命题，却不能给予确切的证明。为弥补这种缺陷，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西方名著《几何原本》，在具体介绍数学几何知识的同时，提供了一种思维逻辑的工具和证明方法，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推崇，并对修订历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稍后，由徐光启主持编纂的一百三四十卷的《崇祯历书》，更是在汤若望等耶稣会士的参与下，吸收欧洲科学革命的成果，并以西法为基础而完成的。整个清朝都一直在沿用《崇祯历书》。

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第四个贡献，即把一个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第一次正面地介绍给西方，开创了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新纪元。利玛窦晚年，根据他在中国20多年的传教经历撰写了《天主教传入中国史》（即《利玛窦中国札记》）。他逝世后，该书由耶稣会士金尼阁带到欧洲用拉丁文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等版本不断出现，欧洲知识界都在关注这本书。利玛窦以亲身见闻所描述的中国地大物博和繁荣富庶的情景，具有真实感。而他经过认真思考，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赞誉，也很有说服力。这样一个非基督教世界的高度发达的文明的呈现，

大大开阔了西方学者的眼界，成为后来进步思想家汲取灵感的精神资源。

上面我们谈到利玛窦开创中欧关系新纪元的突出贡献，那么，徐光启作为同西方文化接触的中国第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从西学中得到哪些思想启迪和科学知识，用来提振民生与拯救危机呢？这就不能不从其家世和社会理想说起。

徐光启是上海人，家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好，父亲下田务农，母亲早晚纺织，以求温饱。尤其是上海那一带靠海，经常遭到倭寇的侵害，非常之严重，徐家老小只得逃难到外地，家庭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加上他亲身体验到父母及周围民众从事工农业生产的辛劳，所以徐光启自小就忧国忧民，思索怎么样能够使明朝这样一个国家兴旺起来强大起来，不受外界的侵略；又怎么样能够改良工农业技术，使人民富裕起来。所谓民富国强，就是他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在他心目中，上古唐虞夏三代那种是非邪正分明的道德，四民之业（士、农、工、商）卓见实效，国家强兵建功于世，百姓和睦均平，便是他理想的社会。可是，从万历到崇祯年间，这个时间段明朝经济上虽然繁荣，政治上却非常腐败，民不聊生，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这种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和尖锐矛盾，使徐光启急需找到一条改变现状实现理想，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途径。他就是抱着这样救国救民、“经世致用”的思想，去跟利玛窦交往的。他是最早跟利玛窦接近的人，并且相信可用西方的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来改造当时的明朝社会。这样一来，他在政治思想的结构、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军事战略的改革方面，都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与举措。

其一，在政治思想的结构上，徐光启主张融合儒家和基督教的精义，以取代传统的儒释道结合的价值体系。



徐光启跟当时的有识之士一样，认为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腐败。他说，儒家的道德学说，只能规范人们外在的言行，却不能触及人们内心的情感，所以防范愈严，欺诈也愈加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援释入儒，借助佛教生死归宿在于来世之说，以弥补儒学之不足。原来指望这种善恶报应在身后的说教，可以惕厉人心，取得为善去恶立竿见影的效果，殊不知自佛教传入中国千百年来，不仅世道人心未见改善，而且随着佛教的流弊愈演愈烈，人们更加无所适从，也无所依据。足见释道诸家，道术未纯，教法未备，辜负了朝廷 200 多年来推崇表彰的盛意。

有鉴于此，徐光启明确提出，唯有引入与儒家主旨相契合，而跟佛老学说相抗衡的西方事天之学，才可以补益王化，引导儒术和救正佛法。既能化民导俗劝人为善，又能使国家致盛治保太平。如此兴化致理，必可达到唐虞夏三代的理想社会。为实现这补儒易佛（补儒之不足而驱除佛法）的纲领，改变传统的价值体系，徐光启强调，西学是一个整体，包括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平天下之术，下及历算、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都应该根据中国情况，一一斟酌施行。

也许因为救世心切，或者因过去浸淫佛学太了解其弊病，故徐光启批判起来过于严厉。然而，在那传统价值体系已经腐败，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明朝末年，徐光启这种寻求新的中西结合的思想学术基础，通过引入西学提振中国的民生国防的努力，在当时还是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于已经融入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的佛学，也不可能就此被剔除于外。将来的发展，如果不是因为罗马教廷的横加干涉而中断，那么我们看到的，很可能是在中国文明的包容下，儒基（基督教）释道四教荟萃，合为一体

的壮观场面。这在当时同样著名的信教士大夫杨廷筠的思想中，已多少有所显露。

其二，在科学文化的交流上，徐光启主张融汇中西科学文化，达到会通超胜的目的。并在数学乃一切科学基础的新观念指导下，实行全面振兴科学的计划。

虽然徐光启主持编纂的《崇祯历书》吸收了为数不少的西方科学理论和实验成果，但这既不是盲目崇拜，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在充分认识中国历法落后、西法至为详备的情况下，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原则，展示其汇合中西文化的气魄和雄心。在这里，徐光启认为会通中西包含三个内容。第一是翻译，这是会通的条件。即尽可能译介西方科技文化方面的成果，使人能参照比较，循习而求进步。第二是融合，这是会通的核心。其要求是熔炼彼方的材质，融入我中华大统历的型模。第三是超胜，这是会通的目的。经过这样学习、融合和会通的过程，而聚积起来的中西科学文化的精华，不仅远迈于中国古代，而且必将超胜于西方。从历史上看，徐光启对文化交流的深刻认识、坚定信念和科学精神，较之清朝康熙皇帝所谓西学中源说，以及清末张之洞有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具有更为重要的积极意义。

自从跟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徐光启接受了中国未曾有过的数学乃一切科学基础的观念之后，其多年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才出现了崭新的面貌。除在修治历法中，强调数学的统帅作用，还提出“度数旁通十事”的奋斗目标，即大力宣扬将度数之学，逐步运用于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运用于气象、水利、音律、军事、会计、建筑、机械、测量、医药、计时等学科，通过全面振兴科学，来挽救民生凋敝国势衰弱的局面。徐光启逝世后，其继任



者确曾把数学运用于实业部门，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其三，在军事战略改革上，徐光启主张引进西洋大炮和附城敌台技术，组建精锐的火器部队，从而改造明朝陈旧的军事战略体制。

面对明朝与后金战争一再惨败的教训，以及官府火器粗制滥造，对敌布阵墨守成规等弊病，徐光启建议朝廷立即从澳门引进威力巨大射击精准的西洋大炮，按照西洋方法在城门外建筑三角三层、可设置铳炮抗击的附城敌台；改变过去不顾京城安危而急功冒进的战略，实行巩固京城防御，且战且守、稳扎稳打，直达敌巢的战略。这其中，西洋大炮的引进，欧洲先进的铸造技术及其简明实用的数学、物理知识，得以迅速的普及和应用，为军事战略战术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此后，经过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的多年谋划指授，其老师有关筑台制铳的防御战略已为当局重视，并逐渐推行于辽东前线。在孙元化因功升官担任登莱巡抚期间，组建了由西人教练、装备西洋大炮的火器部队。徐光启遂建议朝廷将这支精锐火器部队调往京城，以此为榜样，轮训和改造其他部队。徐光启这种依托于西方兵仗器械和科学技术，对明朝军事战略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曾取得显著的成效。袁崇焕指挥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便是利用西洋大炮的威力与敌台防御战略，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后金军，取得了从未有过的胜利。宁远一战毙敌 17000 余人，努尔哈赤因此被气死。稍后宁锦攻防战，再败皇太极所率十余万军队。

上面我们谈到，明代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世界上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实际接触中，作为双方代表人物的利玛窦和徐光启，所作出的划时代的贡献。那么，这种作用和贡献，对于明史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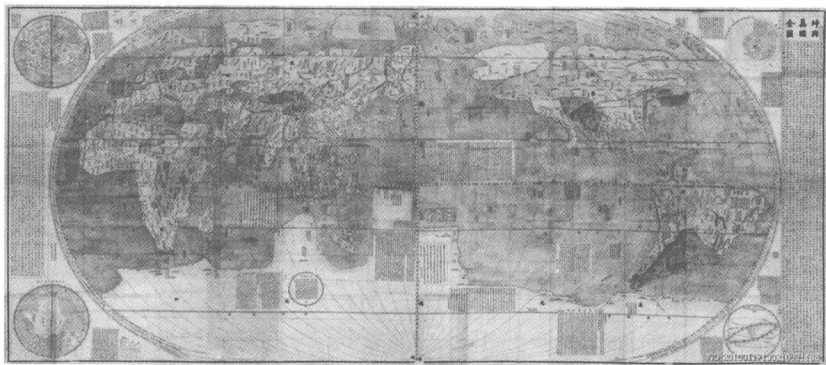
首要的，正是通过这种频繁的接触、交往和贡献，明代历史已

经超越中国断代史的范畴，而成为跟世界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不仅要有微观细致的考证，更应有宏观的世界视野。与此相联系，评价明代历史地位，既要看到它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所存在的弊病，及其社会转型的艰难，又要看到它更臻成熟的传统文化和治理体制，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及其对欧洲社会变革的影响。

高艳林：前面沈先生从几个方面，对利玛窦和徐光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贡献做了全面介绍，使我们对这两个人物有了一个概括性地了解。利玛窦是第一个把西方文明传到中国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把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的外国人。而且他传播的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我们今天还很熟悉，甚至仍在运用。

庞乃鸣：的确如此。比如像“欧罗巴”、“天主教”和“几何”等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又带有西学色彩的词汇都与利玛窦有关。

明中后期，当时欧洲的一些天主教会如耶稣会、方济各会等都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这些西方传教士到达中国后，为了使中国人更好地了解欧洲和教会，便与一些中国人合作翻译许多欧洲著作，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这些沿用至今的名词。以“欧罗巴”为例，这是欧洲的音译称谓，意思是西方太阳落下的地方，是拉丁文 Europa 的音译。最早将 Europa 翻译成中文“欧罗巴”的就是利玛窦，在他的中文世界地图《万国坤輿图》中首次使用，后来随着这幅地图的广泛流传，这个词语逐渐约定俗成，成为中国对欧洲의正式称谓。与之相类似的地理名词还有亚细亚、罗马、地中海、大西洋等。



《万国坤舆图》

天主教在明代以前就曾传入中国，那是在元代，当时不少人将其称为也里可温教。随着蒙古人的三次西征，西亚和东欧地区的许多教会信徒被俘获，有一些被带到中国内陆安置，在有的地区，如大都、泉州等设有主教区，显然信徒为数不少。然而元朝灭亡后，也里可温教也销声匿迹。直到明末这次传教士来华，天主教才再次传入中国，并正式被传教士译定名为“天主教”。“上帝”等宗教名词也是此时传教士与中国信徒们共同译定的。译定名为“天主教”还给传教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因为“天主教”虽然是初次出现，但是“天主”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早已有之，再加上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刻意附会和引领，有的士大夫就认为天主教所尊奉的“天主”就是中国上古时代的皇天上帝，天主教就是先儒的复活和再现，可以弥补宋明理学的不足，挽救当时的社会道德危机。这种天主教的儒学化对于天主教的传播自然是极为有利的。

再说到“几何”、“三角形”、“四边形”等几何学名词，也不得不提到利玛窦以及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这部书是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不朽之作，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由利